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中的文化研究关键词

郝永华

(孝感学院文学院, 湖北孝感 432000)

摘要: 美国文学艺术家、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对于西方文化中“疾病隐喻”的分析表现出了发微见著的洞察力, 言语犀利, 不乏睿智, 但散文化的风格使其缺乏深层的理论分析和论证。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中隐含着几个重要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意义与话语、身体与身份、隐喻与修辞, 这些概念和术语有助于对“疾病隐喻”中涉及的一些文化研究问题进行更加理论化的探讨。

关键词: 苏珊·桑塔格; 疾病隐喻; 文化研究;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6-0019-06

美国文学艺术家、文化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这一亲身体验促成了她有关“疾病隐喻”的论述, 即《作为隐喻的疾病》(*Illness as Metaphor*, 1978)和《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 1989), 国内译者将其合集译为《疾病的隐喻》^[1]。在这两篇长文中, 桑塔格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 在不同历史时期, 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如结核病、麻风病、癌症以及艾滋病等)都曾荷载着文化“意义”, 而且这些意义无一例外地是会造成耻辱感的、惩罚性的道德意义, 而疾病获得这些道德意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在各种话语中把疾病作为一种隐喻修辞来使用。桑塔格的目的在于消除“疾病隐喻”, 剥离疾病所承载的任何道德意义, 呼吁人们把疾病仅仅看作一种没有道德意义的生理现象。

有关《疾病的隐喻》一书的评论颇多, 有的论者重在对其观点进行梳理和概括, 从而发出消除疾病隐喻的倡议^[2-3], 有的论者则从“反对阐释”的文艺主张来分析疾病隐喻问题^[4]。我们可以从桑塔格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几个重要的文化研究关键词——意义与话语、身体与身份、隐喻与修辞, 这些术语将有助于对“疾病隐喻”中涉及的文化研究问题进行更加理论化的探讨。

一、意义与话语

在我们的文化和社会中疾病如何获得了道德意义? 桑塔格认为疾病的道德意义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它们被当作隐喻来使用。她所谓的“隐喻”, 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定义, 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1]183}。简单地说, 疾病隐喻就是把疾病作为形容词, 把某事物言说为“像”或“是”疾病, 从而在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判定此事物恶心、丑恶、不正确。桑塔格在论述中引用了西方文化中的许多疾病隐喻, 比如, “西藏的那种隐修生活方式, 对文明来说, 是一种结核病”; “看

收稿日期: 2008-03-20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2005Y305)

作者简介: 郝永华(1979-), 男, 山东东明人, 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西方文论

任何一个大城市纵横交错的平面图,就是在看纤维瘤的纵横交错”^{[1]67-68}。通过一种特殊的“影射”作用,人们对于邪恶事物的感受被移置到了疾病身上,疾病由此获得了众多的道德意义。桑塔格强调了疾病通过进入人类话语的修辞系统而获得道德意义的方式,而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而言,问题本身则更加复杂。

在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发生“语言学转向”之前,人们一直以为,意义来自于事物本身,人类语言的功能只是正确或错误地把它“找到”。这一传统观点逐渐为推动“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家们所质疑和抛弃。其中,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其名著《人论》中指出:“一个符号并不是作为物理世界一部分的那种现实存在,而是具有一个‘意义’。”^[5]符号以其“非物理实在性”而属于文化的意义世界,成为人们建构意义和阐释世界的工具。因为,人类不能用“现实的桌子”去思考,而只能用“桌子的符号”去思考。文化是一个符号之网,它把人类经验编织成意义的网络。换言之,人类通过符号来建构经验世界的意义。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则更为激进,它认为人类语言不是外在世界的“镜子”,“意义”并不存在于事物本身,而是由语言内部的“差异”结构所建构。上述有关意义的建构主义观点使我们认识到事物获得文化意义的语言或符号基础,这是一种符号或语言哲学层面的探讨。这种探讨在经验层面会遇到一些困难,问题也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采用某种知识来阐释事物,从而赋予其某种意义;而且,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纠葛中所进行的社会实践也会使事物获得某种意义,尤其是伦理道德方面的意义,如善与恶、正义与邪恶。人类的知识和实践,都是符号化的,这一点已经为卡西尔令人信服地证明。由此可见,语言和各种文化符号,是人类建构事物文化意义的工具和基础,而人类知识和社会生活实践,则是人类生产和建构事物文化意义的最主要领域。如何把意义产生的多个维度统合起来,福柯的“话语”(discourse)概念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

“话语”作为一个语言学概念,其内涵大致与索绪尔的“言语”(parole)概念相当,指人们的实际语言运用及其结果。米歇尔·福柯赋予了这一概念更加丰富的内涵,使其成为当代理论与批评的关键概念和术语。福柯的话语概念是对于结构主义语言(或符号)概念的一种继承和超越:“简言之,尽管语言(langue)可能是抽象的,但意义绝不是抽象的。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formations)的产物,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因此,任何语言系统所能产生的、潜在的无限意义,总是被遍布于特定时空并且本身也经由不同话语而得以呈现的社会关系之结构所限定所固定。”^[6]结构主义对于意义产生机制的分析,是形式的、共时的、抽象的,尤其缺乏社会与历史维度。它无法解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关系中,现实社会的面貌和权力关系如何确定事物的意义,如何建构当时的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系统。福柯用话语概念表示一种谈论或阐释某一历史时期特定事物或话题的“方法”或“机制”^[7],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权力与利益关系的产物,涉及知识、权力与社会实践。话语概念关注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时期,在特定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中,人类赋予事物意义的复杂性。事物本身没有意义,各种特殊的话语生产或建构了事物的意义。当代理论界对福柯的话语概念的使用已非常普遍,甚至有些通俗化。比如革命话语、政治话语、男权主义话语、殖民主义话语等,这些使用方式强调知识或观念建构事物文化意义的意识形态性;再如道德话语、宗教话语、科学话语、迷信话语等,这些使用方式强调知识或观念生产事物意义的类型;还有文学话语、电视话语等使用方式,它们强调意义生产的媒介、方式及特征。尽管“话语”概念的使用远比上面列举的更为复杂,我们还是可以简单地把话语概念的内涵理解为:一种生产事物意义的价值立场或阐释范式,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关系和知识结构的产物,具有历史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意义是特定话语建构的结果,疾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也是如此。疾

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并非直接来源于隐喻修辞，而是根源于身体在人类生活中具有的特殊价值，正是由于身体的特殊价值，各种疾病就很容易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获得复杂的文化与道德意义。换言之，人类特定历史时期的知识状况和生活关系所产生的各种话语是疾病文化与道德意义的直接来源，而疾病隐喻则使这些意义与价值得以流通、积累和强化。桑塔格历数了特定时期的西方文化如何以非科学的话语，尤其是迷信话语、道德话语，建构有关疾病的“神话”（myth）和文化道德意义的现象。对于某一无法治愈的疾病（如结核病、麻风病），由于当时没有科学（或医学）话语能够给予合理解释，就变得非常神秘，各种类型的非医学话语开始填补这一空缺，使这一疾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变得匪夷所思。比如，《伊利亚特》、《俄狄浦斯王》所体现的古代世界把疾病当作上天降罪的工具；结核病经常被想象成一种有启迪作用的、优雅的病，因为肺部位于身体的上部，更靠近人的灵魂；膀胱癌，由于患处在下身，而获得了更多耻辱性的意义。桑塔格坚持把各种疾病仅仅作为一种生理现象，表现出了某种科学（或医学）主义的倾向。

二、身体与身份

桑塔格说：“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15] 疾病有关社会个体的身体，也会产生一种社会身份。由于性别、种族和一些消费形式都与身体有直接的关系，身体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文化研究的视域中，身体不仅是一个生理的、自然的实体，而且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念与社会权力铭刻其中的场所，不仅如此，身体还涉及社会个体的身份认同。人们在生活中装饰自己的身体，节食、健身和美容，把自己的身体形象男性化或女性化，这些都是形成自我主体性或身份认同的形式。自然的身体可以通过许多形式转化为各种社会身份，如性别特征（男人与女人）、肤色（有色人种与白人）、美丽与丑陋（美人与丑八怪）等等。

英国文化研究学者肖恩·尼克松说：“身份是必需的构想或必需的虚构。我们需要它们在世界中起作用，将我们落实到与其他人的关系中，并组织成一种我们到底是谁的感觉。”^[8] 我们生活在关系化的社会中，短期或终身“扮演”某个社会角色不可避免。某一社会身份总是携带着一套道德观念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而人们又总是需要身份认同赋予生活某种价值和意义，需要身份认同指导自己的社会行为。“我们到底是谁”，比如男人与女人、贵族与平民、白人与黑人这些社会身份，不仅意味着个体“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与行为规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具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与人生追求。因此，社会身份总是作为一种分类、分层形式和规范性力量影响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的生命体验。优越的社会身份会带来更多的生存资源和精神荣耀，而低劣的社会身份将限制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带来一种精神与道德上的平庸感、耻辱感。

由于疾病涉及虚弱的、可能走向死亡的身体，患病的人我们称之为“病人”，患病的身体也就转化为一种公民身份。英国学者丹尼·卡瓦拉罗在其《文化理论关键词》中提到：作为文学艺术中常见的表现对象，身体常常被当作赞美人的力量、能力和美丽的手段，而“个人的身体被精灵、魔鬼、吸血鬼，更近一些，是外来生物，所攻击，这个不断回归的主题，戏剧性表现了人对于不够稳定的身体形式的焦虑”^[9]。我们可以从上述文艺事实推想出：身体的健康与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理或自然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健康的身体是社会个体完成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基础，不健康的身体意味着个体的虚弱和无力。严重的疾病不仅仅意味着即将面临的死亡，还意味着病人不能完成自己的人生理想、社会责任以及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出于对身体健康的担忧和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很容易与疾病划上等号，而各种非医学话语也就成为言说疾病的常见选择。由此，身体的健康与疾病就很容易在人类文化中获得各种道德伦理意义，尤其是那些由于性冒险所招致

的疾病。各种文化话语所生产的有关疾病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实际上是在建构一种或虚弱、或邪恶、或低劣的社会身份。病人,或被认为是由于虚弱而应该受到特殊照顾的弱者,或被认为是性格和生活习惯有缺陷的人,或被认为是已经没有发展前途的人,或被认为是由于自身的邪恶、不道德而应该得到惩罚的人,或被认为对家庭不负责任、拖累家庭的人,或被认为是行将就木的人。

无论各种社会话语把疾病的来源归于天谴、不良生活习惯、遗传还是性格,对患者而言,“病人”都是一种容易产生耻辱感的社会身份。而且被言说为无法治愈的疾病,更容易产生令人绝望的“即将死亡的病人”这种社会身份,病人如果认同这种身份自然也就放弃任何可能有效的治疗。更为严重的是,各种社会话语赋予疾病的耻辱性道德意义,将给病人带来更大的屈辱和精神压力。患者本人则由于具有了某种病人的身份而获得相应的道德体验和生命体验。对此,桑塔格说:“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118]这一观点不禁让人想起鲁迅《药》中的一段话:“华大妈听到‘痲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10]

任何事物一旦进入人类话语就具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包括那些人类完全无法解释和理解的事物。疾病作为一种文化客体也不可能没有文化意义,其实,把疾病仅仅作为一种生理现象,也是赋予其文化意义的方式,即一种以医学或科学话语生产疾病文化意义的方式。桑塔格倡导停止使用疾病隐喻,把疾病仅仅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看待,实际上就是想去除疾病和病人身份所携带的道德意义。一个开明、宽容和进步的文化应该消除和减少疾病的道德意义,即使是那些由于性冒险而导致的疾病。这一点,对于医生而言尤其如此。桑塔格说:“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1175]我们的文化应该表现出更加鲜明的乐观主义和人道主义,任何可怕的疾病都会被最终克服,任何病人都应得到医学上的治疗和道德上的同情或宽容。这样,“病人”这种特殊的社会身份就不会给患病的个体带来精神上的痛苦和道德上的折磨。值得反思的是,人类通过编织一个文化的网络而过上文明和优雅的生活,然而,文化中的一些意义和价值却可能成为人类自身痛苦的根源。有关疾病、病人的道德意义如此,有关下层阶级、女性、黑人、少数族裔等社会身份的许多文化意义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更是如此。人类文化的进步,正包含着对这些意义与价值的清理。

三、隐喻与修辞

对于隐喻修辞的使用,桑塔格的基本观点是:“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1183]隐喻和其他修辞形式,往往被认为是对于日常话语的偏离,它们主要的存在领域是文学艺术。尼采很早就试图颠覆这一常识性的观点。他提出,隐喻是语言的存在方式,甚至真理也是隐喻、换喻和拟人^[11]。时至今日,关于语言的隐喻性和修辞性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理论界的共识。美国当代认知语言学家纳可夫和约翰逊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们在其名著《我们赖以生活的隐喻》中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是无所不在的,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思想和行为中,我们赖以生存和思考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本质上说都是隐喻性的。”^[12]在纳可夫和约翰逊看来,隐喻修辞在人类话语中无所不在,如“桌子腿”、“针眼”、“箭头”、“了如指掌”中的身体隐喻;“人生道路”、“人口逐年增加”、“把温度调高”、“情绪高涨”中的空间隐喻;“大脑是台机器”、“人类社会的肌体”中的结构隐喻,等等^[13]。虽然我们的话语和思维无法摆脱隐喻修辞,但我们却可以废止一些对文化意义的生产与流通有害的隐喻,尤其是疾病隐喻。一方面,疾病隐喻使疾病获得了更多更具耻辱性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疾病隐喻又很容易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修辞,用来调动大众的盲目、激情和非理性。

桑塔格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疾病隐喻的“影射”作用以及它给疾病带来的道德意义。疾病作为人类产生恐惧的重要源泉之一，很容易使人把它与其他人类邪恶联系在一起。因此，当人们思考和描绘邪恶和不道德事物时，疾病隐喻就成为一种廉价的、唾手可得的选项。由于人们不断地把疾病与其他可恶和不道德的事物相提并论，疾病的邪恶和不道德意义也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这是疾病进入人类话语修辞系统之后获得意义的特殊方式。然而这种疾病隐喻的修辞却给病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桑塔格还特别关注疾病隐喻在政治修辞中的运用。在谈论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时，桑塔格说：“为了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邪恶，我们于是寻求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只不过是些廉价货。……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175]在桑塔格看来，政治领域的疾病隐喻从来都不是清白的，它的目的无外乎煽动暴力，使严厉的措施正当化。关于这一点，桑塔格列举了许多例子，如，阿拉伯人常常把以色列说成是“中东的瘤子”；托洛茨基曾把斯大林主义称作马克思主义的癌瘤；纳粹宣称血液中混有其他种族血统的人都“是”梅毒患者。

按照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观点，修辞是一种使用语言符号以说服他人、影响他人态度的技巧。作为一种修辞性的表意方式，疾病隐喻不仅仅使话语表达更加生动，更具有一种“说服”的功能。疾病隐喻在政治话语中的运用正是一种意识形态修辞。英国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认为，修辞“诞生于政治与话语结合之际”^{[141]42}，并且在所有历史时期，修辞都“是统治阶级获得政治霸权技巧的文本训练手段”^{[141]33}。他还提出，修辞不在于命题的真假，不涉及认识论，而在于能否劝说或怂恿他人以达到某一现实效果。比如，“黑即美”（Black is beautiful）是一个“反霸权”的修辞范式，这个口号让黑人认同和赞美自己身体的颜色，它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反映了“现实”或“真实的事态”，而在于它能够产生一系列有利于某些实际做法的效果^{[141]48}。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政治话语中的隐喻发生作用的机制，并不在于准确、生动地陈述事实和真相，而在于使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意图“合法化”，并劝说或怂恿大众与之配合。因此，在很多情况下，说某事物“像”或“是”另外一个事物，并不是为了更好地、更鲜明地说明和形容这个事物的状况或特征，而是为了“说服”的目的。

问题的吊诡之处在于，疾病隐喻作为一种对于事物相似之处的简单列举，并不如理性分析、逻辑证明更具有“说服力”，但它却具有如此大的“说服”功能。美国当代新修辞学代表人物肯尼斯·伯克的修辞学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伯克把修辞定义为：“人使用词语形成态度或导致他人采取行动。”^[15]仅从定义上看，他的修辞观与传统观点并无多大区别。然而，伯克强调，修辞性话语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建立认同（identification），然后才具有说服的功能^[16]。“认同”意味着认为或感到自我与他人之间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如职业、国籍、种族、行为方式、情感经验或价值观等方面的相同之处。在很多情况下，修辞效果的产生并不在于直接的理性说服或逻辑证明，而在于通过某种方式与受众建立认同。伯克还指出，寻找共同的对立面或敌人是建立认同的一种重要方式。疾病隐喻正是通过确立共同的敌人而产生认同。梅毒、癌症、艾滋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说某事物“像”或“是”疾病，实际是在把对于这些疾病的恐惧和厌恶投射到某个对象上，以便激发人们的想象，即想象出一个共同的敌人，从而在民众中激发起某种认同感。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往往并不在于这种疾病隐喻可以生动地、形象地陈述某个事实，比如“混血人群确实是坏的”，而在于它能够激发起人们的想象和认同，以达到某一现实的效果。可以说，政治话语中的疾病隐喻调动的不是理性，而是激情，激发的不是逻辑分

析,而是使问题简单化的盲目与冲动。

参考文献

- [1] [美]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魏,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2] 韩笑. 观看自我之镜: 评《疾病的隐喻》[J].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 2006, (2): 98-104.
- [3] 覃慧宁. 如何揭示被“隐喻”遮蔽的真实: 评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J]. 西北民族研究, 2006, (2): 194-198.
- [4] 孙燕. “反对阐释”的文化批判向度: 关于桑塔格《疾病的隐喻》[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8(5): 82-86.
- [5] [德]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72.
- [6] [美]约翰·费斯克. 关键概念: 传播与文化研究词典[M]. 李彬, 译注.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4: 85.
- [7] [英]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的运作[C] //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44.
- [8] [英]肖恩·尼克松. 展示男人味[C] // 斯图尔特·霍尔. 表征: 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徐亮, 陆兴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07.
- [9] [英]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 张生, 赵顺宏,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08-109.
- [10] 鲁迅. 鲁迅作品精选[M]. 童秉国.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22.
- [11] [英]安德鲁·本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 关键词: 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 汪正龙, 李永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6.
- [1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
- [13] 吴宪忠, 朱锋颖. 隐喻理论多维思考[J]. 北方论丛, 2006, (3): 56-57.
- [14] [英]特里·伊格尔顿. 沃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M]. 郭国良, 陆汉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5] Burke K. *A Rhetoric of Motives* [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41.
- [16] 鞠玉梅. 肯尼斯·伯克新修辞学理论述评: 关于修辞的定义[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5, (1): 72-76.

Keywords for Cultural Studies in Susan Sontag's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HAO Yonghua

(Faculty of Humanities, Xiaogan University, Xiaogan, China 432000)

Abstract: Susan Sontag is an American artist and cultural critic. Her analysis on the “Illness as Metaphor” in western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penetrating insight, incisive language and full of wits. However, as a result of a prose style, the analysis is not an in-depth one or argumentation. Sontag’ critic practice includes a couple of theoretic concepts and critic terms: meaning and discourse, body and identity, metaphor and rhetoric, which help to conduct a more theoretic discussion on some issues on the cultural studies entailed in “Illness as Metaphor”.

Key words: Susan Sontag; Illness as metaphor;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编辑: 饶道庆)